



Wester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 Research

批判视野下的 西方传播思想

石义彬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批判视野下的 西方传播思想

石义彬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石义彬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10623-8

I. ①批… II. ①石… III. ①传播学—研究—
西方国家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295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

石义彬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623-8

2014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7

定价: 78.00 元

目 录

绪 论 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中审视西方传播理论	1
第一章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及其传播学启示	4
第一节 人的异化与理性的沦落——关于启蒙的批判	4
一、理性的沦落	5
二、人的异化	8
第二节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现实渊源	9
一、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背景	9
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时代文化特征	13
第三节 文化工业批判	18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	18
二、文化工业及其特征	21
三、媒介与文化工业	27
第四节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	31
第五节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	42
第二章 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研究	47
第一节 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概述	47
一、哈贝马斯的学术简历	48
二、哈贝马斯与传播学	49

第二节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55
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写作背景	55
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渊源	57
三、公共领域理论的发生史、内在矛盾	59
四、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	69
五、公共领域的重建	72
第三节 交往行动理论	73
一、公共领域的困境及其解脱	74
二、普通语用学	77
三、交往合理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80
第四节 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与当代中国	85
一、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评价	85
二、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公共领域理论的实践考察	91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依法治国	95
四、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传媒领域阶段	101
五、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发展	105
第三章 斯图亚特·霍尔及其文化研究学派	112
第一节 一生寻找自我身份的学者——霍尔	112
第二节 文化——霍尔与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核心问题	115
一、文化研究的传统	117
二、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	123
三、《文化研究：两种范式》——文化研究的经典文献	128
第三节 斯图亚特·霍尔的传播思想	133
一、编码/解码理论为媒介研究提供全新的解读模式	133
二、受众解读的三种模式	137
三、霍尔的媒介研究对传播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	139

第四节 霍尔理论的思想来源	144
一、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对霍尔的影响	144
二、霍尔与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	151
第四章 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研究	157
第一节 奇才或是怪物?	157
第二节 麦克卢汉的标志:独特的麦克卢汉式表述方式	161
一、“像泡澡一样进入我的作品”	161
二、艺术家的眼睛——格言警句加暗喻堆砌	163
第三节 媒介即讯息	165
一、媒介就是人的延伸	166
二、讯息就是新的尺度	167
三、媒介是什么讯息	169
第四节 地球村与内爆	179
一、地球村——时空消失的人类新部落	179
二、重新部落化——麦克卢汉的乌托邦世界	183
三、卡德穆斯降龙的牙齿——媒介技术的力量	186
四、电子媒介时代的警铃——内爆	191
第五节 “弃儿”重回批判理论阵营	193
一、麦克卢汉的学术认同	193
二、方法论上对批判阵营的回归	196
三、麦克卢汉的理论贡献	197
第五章 鲍德里亚的传播理论与思想	200
第一节 鲍德里亚的传播思想概述	202
一、鲍德里亚其人	202
二、鲍德里亚的理论定位	205

第二节 鲍德里亚理论的历史系谱	209
一、结构主义 / 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210
二、罗兰·巴特：物的符号学	213
三、符号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源流	217
第三节 鲍德里亚的符号批判理论	228
一、消费社会与物 / 符号体系	228
二、符号消费中构建的消费文化	231
三、符号价值与广告图腾	235
第四节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性媒介分析	241
一、法国的“麦克卢汉”	241
二、仿真、超真实、内爆	244
三、视觉媒体与电视	249
第五节 鲍德里亚媒介观的现实意义	255
第六章 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影响	260
第一节 福柯的生平及学术研究	261
一、一个充满叛逆细胞的“异数”	261
二、一个难以界定的“斯芬克司”	265
第二节 话语理论	268
一、话语是理解社会文化的钥匙	269
二、话语是一种“事件”	271
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剩余”	274
四、话语分析的社会和实践向度典范	276
第三节 微观权力理论	279
一、研究权力问题的动因	279
二、微观权力理论的内涵	282
三、对传播研究的影响	288

第四节 全景敞视理论	291
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全景敞视社会”	292
二、信息传播新技术——新的监视技术	300
第七章 女权主义的传媒批判理论	304
第一节 基本概念辨析	307
一、“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	308
二、“受众”与“传者”	309
三、“女权主义的媒介批评”与“女权主义的传媒批判”	311
四、“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意识”与“性别敏感”	312
第二节 女权主义与传媒批判的融合	312
一、女权主义的主要流派	314
二、女权主义与传媒批判的有机融合	320
第三节 女权主义的受众批判	324
一、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受众观	327
二、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受众观	331
三、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受众观	336
四、后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受众观	341
五、后现代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受众观	347
六、中国化思考的两个维度	359
第四节 女权主义的传者批判	362
一、以女性传者为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362
二、女作家和女导演的性别意识	364
三、女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地位	379
第五节 女权主义传媒批判的研究意义	393
一、理论意义	394

二、实践意义	396
三、方法论意义	399
第八章 结构主义与传播研究	401
第一节 渊源：索绪尔及其结构主义语言学	404
一、索绪尔的简历	405
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观点	406
三、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影响	408
第二节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	412
一、罗兰·巴特的简历	413
二、罗兰·巴特符号学的主要观点	414
第三节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观点	420
一、列维-斯特劳斯简介	420
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观点	421
第九章 达拉斯·W. 斯迈思的传播思想研究	428
第一节 斯迈思传播思想概述	430
一、斯迈思其人	430
二、斯迈思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	433
第二节 斯迈思的受众商品理论	436
一、斯迈思受众商品理论的渊源	436
二、受众商品理论的形成背景	439
三、受众商品理论评述	441
第三节 斯迈思的传播学思想与当代中国	448
一、进入中国语境的反思	448
二、“自行车之后，是什么？”	449

第十章 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媒介批评思想研究	453
第一节 争议中前行的格拉斯哥媒介小组	453
一、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研究概述	454
二、争议旋涡中的格拉斯哥媒介小组	459
第二节 新闻生产：真相和权力	463
一、“眼见不一定为实”	464
二、新闻是权力博弈下的再现	467
第三节 新闻接收：接受和抵抗	475
一、强有力的媒介信息	475
二、媒介信息解读的多样性	477
第四节 格拉斯哥小组媒介思想的批判性、科学性与现实性	482
一、格拉斯哥小组研究的批判性和科学性	482
二、从格拉斯哥小组的研究视角看当代中国媒介	486
第十一章 汤姆林森的文化传播思想研究	490
第一节 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阐释与价值选择	491
一、文化：生活方式、表意实践与非精英主义	492
二、帝国主义：超越政治与经济的纠缠	497
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间、不平等与支配	499
第二节 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批判与解构	502
一、重视文化与受众：对媒介帝国主义话语的批判	503
二、文化动态生成论：对民族国家话语的批判	509
三、为同质化辩护：宿命论与对差异优先性的批判	514
第三节 全球化与文化体验的转型	520
一、作为复杂联结的全球化	520
二、非领土扩张化：全球化的文化表征	526
三、全球化、现代传媒与文化体验的转型	532

第四节 全球化的文化后果与世界主义的可能	536
一、全球化与全球邻居关系的建立	536
二、对世界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	539
三、全球化视域下的世界主义的可能	545
代结语： 批判研究脉络中的新媒体传播思想检视	552
参考文献	565
后 记	581

绪论 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 场域中审视西方传播理论

在西方，传播理论是一个多样化的、处于跨学科以及多种思想方法交叉的“十字路口”式的公共领域。诚如美国学者迪莉娅（J. Delia）所言，西方传播学从未依赖单一的知识来源，也从未统一过。^①因此，它是一个难于把握的学术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此领域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清理，但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他们大多偏重于用抽象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涵盖具体的、历史的、呈现文化多样性的传播理论表述，这就难免产生各种各样“以偏概全”的研究模式，而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下，这些被总结出来的研究模式又不断遭受广泛的质疑，以至于得出“传播科学尚处于‘前范式阶段’”^②的判断。其实，问题并不在于传播理论有没有范式或能否用单一的研究范式来界定，而在于传播研究的“场域性”（contextuality）和人类传播活动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ncies）摧毁了为建立抽象的研究范式而设立的权威性学术话语。

① J. Del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 R. Berger &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7, pp. 20—99.

② R. Craig, "Communication As a Practical Discipline", In B. Dervin et al (eds.), *Paradigm Dialogues in Communication*, Vol 1: Iss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9, pp. 97—122.

1981年，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和斯文·温德尔（Sven Windahl）的《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一书出版时，西方学者构建传播研究模式的热情还没有减退，他们对模式的遵从依然建立在模式的构造功能、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之上，但这两位学者当时还算比较清醒，认识到“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过分简单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阐明的假设等缺陷，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模式无疑是不存在的”。^①同时还看到，“因为大众传播研究的不同途径涉及互不相容的不同侧重点，有时涉及前后矛盾的理论，因此，任何一个全面性模式都可能混淆各种科学的探讨，不可能正确说明现实真实的思想状况”，另外，“一个单一的全面性模式可能会无形中肯定一种单一分立的传播过程的存在，即由作为信息来源的社会转向作为受众的社会”。^②到1994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导论》第三版面世时，研究模式的思想已淡化，开始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和科学主义研究方法为横轴，以媒介和社会为纵轴，把传播研究切割成媒介—文化论、媒介—唯物论、社会—文化论以及社会—唯物论四个不同的面向。显然，这种分析把西方传播研究带到了由“媒介、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场”，呈现出传播研究的“场域性”，放松了主流传播学那种以“传播者—讯息—通道—受众—效果”为模式的操纵力量。

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知识的一种后现代状况，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方面），一些理论家倾向于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关于“无序”的微观模型上，而较少关心“有序”的精致理论视野。^③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

①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③ James Gleick, "Solving the Mathematical Riddle of Chao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10, pp. 30—32.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说，“后现代知识不是权威的一种工具，它提炼我们对于差异性的敏感性，并且强化我们容忍那些无共同尺度标准而无法比较的事物的能力”，同时，人们也对先前曾给予科学的规则以合理性的“共识”产生了怀疑，“大理论”模式的权威开始消解，更关注场域和社会生活的意义等问题。^①文化批判研究在西方传播学领域的兴起与扩散与其说是某种研究模式的扩散，不如说是在后现代知识潮流的推动下，西方传播研究向“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的转向。其实，任何传播研究模式都是在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产生的，只不过我们对这一事实不够重视，总是习惯于泛化传播研究模式或制造适应全球传播的大传播理论模式，以至于传播理论之争常常被简化为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之争，很少把目光投注到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去，从而在权威话语的操纵下描述传播现象。这可以说是现代传播理论表述的危机，它意味着传播理论转变过程的开始，即向“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的转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应仅仅局限在理论模式和方法的层面，还应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意义中去重新审视西方传播理论，或者说，我们要把西方传播理论的阐释由以前的理论模式和方法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问题，转换成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的表述问题，以真实地理解其发展的历史和逻辑。

① 转引自〔美〕乔治·马尔库斯、米卡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页。

第一章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 及其传播学启示

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而言，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无疑是其开创者。综观法兰克福学派诸多颇具影响力的学者的著作，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印象：法兰克福学派最大的特点也许就在于批判，不懈地、绝不妥协地批判。从早期的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到第二代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学者，从启蒙运动、理性到大众文化等各个概念领域，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批判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通过批判为资本主义制度把脉疗伤。

第一节 人的异化与理性的沦落——关于启蒙的批判

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在西方文明进程中饱受赞美的“启蒙”首先成为了批判的起点。

在《启蒙时期的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西方的启蒙运动进行了一番重新思考。虽然他们并不否认启蒙运动是对人类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因为通过启蒙运动，人开始用理性来关注自身，而非仅仅将自己看作是上帝的客体对象，但是这种启蒙未必可以在贯彻启蒙思想的运动中一直得到传承和发扬。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神话”与启蒙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启蒙

(enlightenment) 精神反而在启蒙运动中遭到损伤。尤其是当启蒙运动宣传的理性和发展等观念代替上帝之后,有可能给自己建立了另一个神话。人类推崇理性的做法很可能最终将理性推上神坛,让理性本身成为神话,进而扼杀理性。

理性一旦变成神话,我们就必须对这种理性持以非常谨慎的态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猖獗进行分析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西方现代历史中的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一种单面性,它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运用到人的社会中,作为人类自身的统治原则,将对自然的操纵和控制意识同时运用到对人类自身的操纵和控制中,如同膜拜技术一样信奉对人类自身的统治技巧,从而将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这便是现代极权主义能够兴起,而且还不被人警觉的原因。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现代社会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它的根本问题是西方哲学和文化试图去统治“客体”、他性、自然和他人。^①

一、理性的沦落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时期的辩证法》一书中着重强调的便是启蒙运动并没有成就真正的理性,而是让理性沦落为工具理性。在理性被工具理性取代的现代社会,人的异化将会是必然结果。技术进步给人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主体性的丧失,但问题是如果这种异化被一个新的神话覆盖,那么我们又如何认识到自己只是陷入到另一个神话中了呢?

对“理性”的讨论本来就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人类漫长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理性逐渐战胜感性、突破感性的过程。按照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的观点,用人类历史上几个思想极度

^① 参见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繁荣解放的时期作为分界点，我们可以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和 19 世纪工业革命时期以及新世纪等。文艺复兴前的第一代思想家们用他们骄人的工作唤醒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人是可以思考和总结的。人具有理性，人可以用理性来关注自己，而不仅仅是由上帝或神灵主宰。经过了长期而艰苦的酝酿后，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带着人间悲苦色的基督和圣母画像，有了将人类自身作为分析对象的莎士比亚戏剧。

进入启蒙时期后，人们对理性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人类不仅相信自己可以拥有理性，而且用理性演绎方法，得出了叫作“科学”的答案，并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我们有了褒扬和预言“科学”的培根，还有一生为科学做注释的天才——牛顿。“大自然和大自然的法则躲在黑夜里，上帝说：‘让牛顿干去！’一切就大放光明了。”^①

理性向一切过去由感性占领的领地发出挑战，不断地解除神秘，不断地构建一个由理性定义的社会。在工业革命时期及以后的岁月中，人们不再信仰任何神灵而是有了新的膜拜对象，那就是“理性”自身。一个“理性”不断膨胀的时期从此展开。在这样的时期，人们的真实需求被压缩成条例与法规，冰冷的机器压迫在每个人身上。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技术理性将人改造成越来越畸形的生物。机器成为政治工具，工业产品灌输、控制、促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加强劳动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整合。结果，劳动者不再为物质的匮乏而发愁，不再认识到自己的被奴役性，反而相信自己很幸福，过着富裕的生活。但这所谓幸福却是虚假的，是机械化掩盖了人被物化的本质。劳动者仍然是受剥削、受奴役的阶级，仍然是作为工具和“物”存在，工业社会虽给劳动者

^①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75 页。